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管理学研究

——再看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地创新的关系

□ 池太岚

摘 要：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方式和结果，再次探讨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吸收西方理论与本地创新的关系。首先，讨论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对中国管理学研究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以及中国管理学研究是否应建立一个独立理论体系的问题。其次，用现有的战略管理研究实例，演示若干个西方经济和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应用和创新对这些理论做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最后，对中国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对企业与企业家的能力及行为取向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关键词：制度环境；西方经济和管理理论；本土化；理论创新

一、引言

自《管理学季刊》创刊以来，多位学者已讨论过中国管理研究中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地创新的关系（李海洋和张燕，2016；Shenkar，2017）。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这个讨论，特别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为视角来再次探讨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地创新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独立的管理体系”的课题。但不应忘记，这些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有选择、有创造性地引进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是不可分开的。正如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当代经济学研究和政策不断做出深化、修正和创新一样（Krueger，2011；Lin，2012；Lin et al.，2017；Rodrik，2011；Stiglitz，201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企业管理上的发展也能而且也在为管理理论的深化、修正和创新做出贡献。

本文首先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探讨中国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给中国管理学研究带来

的机会与挑战，并对吸收西方管理理论与本地创新的关系做出评鹭。其次用现有的研究实例讨论几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产权理论、内部化理论、知识基础观和实物期权理论。讨论的实例不仅检验这些理论对研究中国管理问题的适用性，而且演示中国制度环境的动态性和独特性如何帮助研究人员对这些理论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做出理论创新。再次对中国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会如何影响企业与企业家的能力及行为取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最后为结语。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环境对管理知识的引进和创新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不同，采取了渐进的方法和路径。西方管理理论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下的适用性自然是相当有限的。但随着改革的扩展和深化，市场的作用不断增大，对市场进行管理的法律规章逐渐建立和发展，市场参与者在理念和行为上也持续转变。这些变化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的体制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特征，让更多的西方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适用于中国企业。但由于中国的经济仍保留了很多历史的“遗产”（除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还有数千年文化社会系统的影响），西方管理学研究对中国企业管理的适用性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在这种不断变革的环境下，通过学习他国经验和独立摸索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也得到了很多在管理思维和方法上创新的机会

会，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和资料。

本部分首先回顾有选择地引进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开始后的高速发展起到的作用，其次探讨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对管理学研究带来的机会与挑战，最后对吸收外来管理理论与本地创新的关系做出评鹭。

（一）中国改革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同引进西方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的包产到户。虽然当时发动和推广改革的领导人主要依赖的可能是从多年经济管理经验中得出的见解，但这些改革的方法与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长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这包括产权理论、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行为学及工业心理学的多种理论。继续深化的改革有很多懂得这些理论的国内外学者参与并提出方案，改革的决策者也对这些理论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了解，并吸取了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改革和创新的经验和教训。

同时，制定和执行改革方案的参谋和决策人员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他们了解的中国现状有选择地、有创造性地应用了这些理论和做法，从而限制了制度变革常常带有的创伤性的副作用，使改革能不断向前推进，让新一轮改革起到降低经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管理效率和提高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有选择地采纳和应用国外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比如，海尔的创始人张瑞敏曾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西方企业管理的书籍以改善自己企业的管理（Paine &

Crawford, 1998), 华为曾聘请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帮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Ante, 2012)。这些善于学习的本土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实践, 将学到的原理和做法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大胆创新, 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总之, 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与成长, 和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后高速发展一样, 同引进外国经济和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 中国的经济改革决策者和企业管理人员避免教条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态度和方式无疑也是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管理学的研究, 不但不能独立于国际管理学研究, 反而应更有机地与国际管理学研究结合起来, 走出早期为能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而“照猫画虎”的方式, 为人类管理学知识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

(二) 中国经济和企业改革的方式对管理学研究提供的机会和挑战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Arrow, 1969; Coase, 1960; North, 1990; Williamson, 1975),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问题是不一样的。因而, 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之间, 何种组织与管理方式对于激励生产者和降低交易成本更有效都受到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

这种与时间有关的制度环境变化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至少两个有利的机会。第一,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 由于西方管理研究传统上把制度环境视为给定因素从而聚焦于企业本身的活动, 组织和管理方法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西

方战略管理研究中只受到了很有限的注意 (Peng et al., 2009)。但中国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可为这个课题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第二,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 由于决策对公司的盈利和生存会产生重大、持久的影响, 战略和组织研究很难使用实验方法 (experimental method)。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自然导致制度环境变革点的存在, 有可能让学者通过按时间取样来用准实验的方法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研究在一般情况下难于研究的问题。

同时, 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也对管理研究造成一些挑战。这首先是给适用的理论提出更复杂的要求。由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行为造成不同的激励和限制, 研究者用实证方法测试某个理论时必须考虑到该理论与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适用性; 否则, 研究会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经济改革常在少数地区实验后逐步推广, 不同地区的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会在同一时间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所以, 搞管理研究的学者要对历史和当时的制度环境有充分而准确的了解才能保证实证研究的严格性。此外, 在一个新的体制改革实施之后, 企业管理人员开始时可能对新体制是否会被有效地执行持有疑问, 并不马上改变行为, 造成管理行为的变化滞后于制度环境变化的实施。这可能会要求做管理研究的学者做更多的稳健性测验 (robustness tests) 来检测统计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最后, 虽然制度环境变革点的存在为使用准实验方法提供了机会, 但采集到可靠的历史数据并不容易。尽管政府的统计机构一般都定期收集有关整个经济状况的数据, 而找到有关企业内部管理与

经营情况和企业之间交易关系的二手数据 (secondary data) 或采集一手数据 (primary data) 常常都是比较困难的。即使能找到当时在职的经营人员, 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也可能缺乏可靠性。

(三) 成功的企业已在建立中国独立的管理理论体系吗?

中国几十年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已经造就了一批已在国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 这些企业自然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力, 将其作为研究中国管理的重要对象或资料来源。而领导这些企业从零开始通过艰苦执着的摸索取得成功的企业家, 无疑多是非常善于学习并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除了从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知识和见解外, 他们还经常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智慧, 把一些中国古代哲学 (如道家、儒家、法家或佛家) 的理念和原则应用到企业管理的实践中, 在自己的企业逐渐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一定内在逻辑的组织管理体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 他们还不断提出新的管理理念, 如张瑞敏在海尔实行的平台化组织 (曹仰锋和李平, 2013; Campbell et al., 2015) 和马云在阿里巴巴实行的中台组织架构 (钟华, 2017) 等, 为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挑战和难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机会。

这些企业家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吸收古今中外管理思想而建立的组织管理体系是否证明他们已经发展了一个中国独立的管理理论体系呢? 笔者觉得这种对“中国独立的管理体系”的强调不仅易失准确性而且可能对中国管理研究产生不利的作用。

第一, 如前所述, 这些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在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智慧的同时也注重从国外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吸收有益的思想和方法。尽管他们发展的管理体系在整体上可能看上去与一个或多个中国古代思想派别的理念和原则一致, 但这种理念和原则上的一致性 (特别是由于下面提及的两个因素) 并不能证明他们建立的组织管理体系构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

第二, 在世界上不同地域发展的文化尽管有很多不同之处, 但它们各自创造的哲学思想有很多一致的理念和原则 (Li et al., 2015; Peng, 2005; Pope & Meyer, 2015)。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遗产, 而不能归于某一种文化。一个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解读的组织管理体系或方法可能也可以用来自其他文化的哲学思想来解读。很多哲学思想和理念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道家的阴阳平衡必然要求决策者做一定的选择, 笔者认为这与现代西方经济哲学里权衡成本效益 (cost-benefit tradeoff) 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三, 哲学的概念和原理都是很抽象的, 牵涉高层次的思维, 在应用到具体的组织管理问题时可能由于决策者的偏好或其他因素引出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这就对在管理研究中把这些哲学思想当作管理理论造成困难。从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 一个对具体问题可能给出多个答案的思维方法不能成为一种有一致内在逻辑的理论。

第四, 现代管理学研究要求用实证的方法来测试理论。把观察到的管理现象或管理方法

归咎于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思想很可能给实证研究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使这样的管理研究不能得益于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第五,这些善于学习和创新中国企业家所建立的组织管理体系可能确实对现代管理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但一个新的理论贡献常常是与现有的理论有联系的,而不是完全孤立于现有的理论。比如,现有组织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Stiglitz, 1989)可以用来对海尔实行的平台化组织的决策结构和激励特征进行精密的研究,而阿里巴巴实行的中台组织架构与从Chandler(1966)开始的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是不无关系的。而且,这些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的优点与弊端及其应用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还有待于管理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做管理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探讨可能的新贡献与现有理论的关系,与经长时间研究和实践积累起来的管理学知识融合起来,促进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和积累。

三、一些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创新

本部分的目的是用现有的研究实例来讨论几个西方理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创新的问题。鉴于笔者本人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研究兴趣,讨论的理论都是源于经济学或以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应用的课题主要属于战略管理和国际商业管理领域。讨论的理论包括产权理论(property right theory)、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和实物期权理论(real options theo-

ry)。

(一) 产权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外合资企业所有权转让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改革从承包制到企业股份化一直参考了产权理论关于所有权的认识,包括企业现金流的权力(cash flow rights)和对企业管理决策的权力(decision rights)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对外开放初期允许和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合资企业的政策就反映了在对非公有制还没有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应用产权理论的一个尝试。

产权理论可分为传统或经典产权理论和新产权理论。传统产权理论(Alchian & Demsetz, 1972; Barzel, 1989)主要研究在不能准确监督生产者的投入时现金流权的分配对生产者的激励作用,而新产权理论(Grossman & Hart, 1986; Hart & Moore, 1990)则注重决策权会如何影响生产者为更长期的经营效益难以在合同中进行规定的投资(如技术开发和顾客关系等)。在生产过程要求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生产者提供投入的情况下(如中外合营企业),产权分配会变得更加复杂,但理论模型的基本见解是,产权分配的比例要考虑到一个生产者的投入对整个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和对其生产投入量(包括质量和数量)进行测量与监督的难度(Eswaran & Kotwal, 1985; Grossman & Hart, 1986)。为分析中国合资经营企业结构设计的问题,Chi(1994, 1996)引入投入贡献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的概念,构建了一个研究合资经营企业最佳产权分配的数理模型。该模型预测,哪方的投入对生产结果更重要或更难证实,哪方就应分配到更多的产权。同时,如果能达到

最佳激励的产权分配与双方在利润分享问题上的议价能力 (bargaining power) 不符 (比如, 由于甲方的贡献难于证实, 最佳产权分配应给甲方 70% 的股份, 而乙方对企业经营效果的贡献虽易于证实但比甲方的贡献更大, 应得到至少 60% 的收益), 双方可以通过利润转让 (如许可证费或特许权使用费等) 来补偿或平衡。这项研究不仅对合资经营企业结构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指出了过度强调本土所有权的潜在经济损失。

产权理论在国际商业领域已得到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 (Chi & Roehl, 1998; Davidson & McFetridge, 1985; Gomes-Casseres, 1989), 但由于数据限制, 只能将产权分配作为因变量而不能直接测量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中国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为这个研究课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Chang (2019) 最近的一篇研究利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实行的开放措施, 直接检测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后合资企业产权变化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这项研究假设, 当中国法律在更多的行业允许外国企业独资以后, 如果合资企业的一方 (外方或中方) 认为自己通过对企业行使更完整的产权可得到更好的经营业绩, 那么该方就会出价买下对方的股份。通过双重差分方法的计量分析, 研究发现这种产权转让 (从中方到外方或从外方到中方) 有改善企业经营业绩的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制度环境变化点 (即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 使这项研究能够采用准实验的方法检测以前的研究难以检测的理论关系, 为制度环境对产权分配和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

(二) 内部化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应用于研究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与技术转让的关系

从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的角度看,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欠缺、对专有技术估价的困难和对交易双方监督的不完善, 跨国技术转让会带来多种成本和风险 (Teece, 1977)。在国际商业领域发展起来的内部化理论认为, 鉴于这类交易成本, 跨国公司在向国外扩张时倾向于建立全资子公司而通常不愿用许可证或合资经营的方式将技术转让给其他公司 (Buckley & Casson, 1976)。从这个理论引出的一个观点是,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在产权方面的限制越少, 跨国公司就越有可能在东道国使用更多和更先进的技术 (Hennart, 1989)。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曾试图用当地成分要求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来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汽车等行业转让技术, 结果仅仅得到了非常过时的技术, 而且这种硬性规定的本土化造成生产成本极高。这看来同内部化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实行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措施取消了对当地成分的要求, 在汽车制造等行业吸引了很多新的来自跨国公司的投资, 不仅让产品技术提到了当代的水平, 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几年后, 一些搞政策研究的人员发现来中国的跨国公司并不在中国搞多少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 特别是整机的开发和设计, 而认为与外资合资经营实际上使本土企业失去了发展整机开发和设计技术的机会 (Lu, 2005)。这些研究人员的报告暗示, 产权分配对技术转让的影响可能要比从内部化

理论引出的笼统预测更复杂,不仅涉及技术转让的数量而且涉及技术转让的种类。

知识基础观提出的一对关于企业能力的重要的概念(Henderson & Cockburn, 1994)是局部能力(component competence)和建构能力(architectural competence)。对开发、制造和销售复杂产品(如需要应用多种技术才能制造出的硬件产品或创造出的软件)的企业来说,局部能力对于解决日常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涉及整个产品的零散部分(如某些部件的开发与制造)或经营的部分功能(如采购、生产或销售);而建构能力则是将所有局部能力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使之有效发挥的能力,对于开发和设计占据技术前沿的新产品是必需的。根据局部能力和建构能力的概念,Chi和Zhao(2014)将跨国公司向在中国汽车制造业实体(包括全资子公司、中外合资公司和从国外购买技术许可证的本土公司)转让的技术分为总体构划与工程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Engineering, ADE)技术和非ADE技术。在将这对新概念融入内部化理论后他们提出,更完整的产权对跨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ADE技术和非ADE技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作为这些公司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ADE技术转让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导致跨国公司一般不愿向与其有关系的中国实体转让这种技术,而且会用其掌握的经营管理权限制这些中国实体从事总体构划和工程设计活动,以减少当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要求得到ADE技术的压力,并降低自己在中国实体工作的技术人员无意中將这种技术流露的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这项研究做出两个假设。

第一,外国公司享有的产权越完整(如独资或占有合资企业的大部分股份),该公司就会更努力、更细致地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第二,外国公司享有的产权越完整,与其有联系的中国实体就会从事更少的总体构划和工程设计活动。通过对从中国汽车行业有外国投资或与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协定的经营实体采集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与这两个假设一致的实证结果。中国一个特定的制度环境特征是,与外资合营的中方公司或在外企工作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由于历史或现行政策的原因,有比较强烈的从外国公司获得技术的愿望。此研究利用这个制度环境特征,调查了产权分配对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两个貌似相互矛盾的影响,丰富和深化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行为在理论上的认识,也为评估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管理政策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 实物期权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风险投资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股权兑现时间的选择

作为一种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评估和优化决策的方法,实物期权理论在战略管理中有广泛的应用(Trigeorgis & Reuer, 2017)。风险投资是为不确定性高的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因而可以在评估投资、撤资、股权转让等决策时得益于实物期权理论的分析(Li, 2008)。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创新项目近年来经历了飞速的增长,风险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成为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Guo & Jiang, 2013)。

对风险投资公司来说,一个投资项目提供

收益的重要渠道是成功地在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关于风险投资项目 IPO 的研究,一般把 IPO 看作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即投资公司在 IPO 之后卖掉其原有的股份,获得投资收益。而研究的注意力主要在影响 IPO 的因素和将 IPO 与其他退出投资项目的方式作比较 (Ball et al., 2011; Bayar & Chemmanur, 2012; Brav & Gompers, 1997)。但也有个别研究注意到,风险投资公司有时并不将其股份在项目 IPO 后马上卖掉,并应用了信号理论 (signaling theory) 来解释这种现象 (Cumming & MacIntosh, 2003)。这种解释认为,由于内部人士 (如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的企业家) 和外部人士 (如股票市场的潜在投资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股票市场有时对 IPO 项目的质量和未来的前景有疑问,会对 IPO 的价格打折扣,但如果市场上的潜在的投资者看到风险投资公司将继续保持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票,他们对项目的信心会增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下 IPO 发行的股票。

中国关于 IPO 的法律与世界第一大风险投资市场——美国的相应法律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要求原有的投资者在一定时间内不得将其持有的股权出售。中国的这种限制是不是可以足够降低现有研究提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风险投资公司在法律允许卖出股票时将其持有的股票马上全部抛出? Li 等 (2019) 出乎意料地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募股的风险投资项目中,约 30% 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允许出售股票一年以后仍然保持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票。而且,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员在面谈时并不把向市场送信号视为他们继续保持

股票的原因,而将原因归于股票价格的不确定性和在未来得到更高收益的可能性。他们所描述的情况与企业追求实物期权价值的行为很相似。这项研究在将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融进实物期权理论后提出,在属于“内部”人士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属于“外部”人士的一般市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两类投资者会对项目长远价值有不同的估价,而且他们不同的估价应随着各自所得的信息而随机浮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持有的股票就相当于一种交换期权 (exchange option), 让他们有权利 (但没有义务) 将股票在有利的时机 (即当股票的市场价格等于或超过他们对 IPO 项目的估价时) 按市场价格兑现 (Margrabe, 1978; Stulz, 1982)。这种交换期权与两个合资经营伙伴之间按事后谈判的价格转让企业股权的实物期权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影响它们价值的因素包括双方估价的相关度 (correlation) 及其易变性 (volatility) 或不确定性 (Chi, 2000)。此项研究对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 IPO 项目股票兑现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实物期权理论一致,但与以前提出的信号理论却在很重要的方面不一致,显示实物期权价值在风险投资公司决定何时将其在新的 IPO 项目中持有的股票兑现时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条件不仅启发了这些学者在此项研究中寻求新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些在中国乃至在国际上广泛存在的现象,而且还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将基于不同理论的两种动机加以区分。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该研究对交换期权的理论分析还澄清了这种期权存在的条件,显示它在很多其他战略决策中 (如并购

和撤资等)都可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对管理学研究有广泛的意义。

四、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会对企业与企业家的能力及行为取向有何影响?

到20世纪80年代实质性的企业改革开始时,严格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实行了近30年。那时的企业管理人员多数没有任何在市场经济操作的经验,只能在实际经营中摸索。而且,由于整个经济体制在渐进改革方式下长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体制变革的动态性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在这种经营环境下生存下来或成长起来的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能力和行为取向有何影响。

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方面是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躲避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的倾向。虽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做管理工作的人未必都怕担风险,但在制度环境剧烈变革时期躲避不确定性的倾向会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一个企业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能够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做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不注意风险的管理和抵消则有可能导致企业不能承受的意外经济损失。躲避不确定性的倾向在国际管理领域已得到广泛研究,但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将这种行为取向视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维度(Hofstede, 1983; Kogut & Singh, 1988; Li & Atuahene-Gima, 1999; Pan, 2002; Rapper et al., 2010),很少注意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情况下管理人

员躲避不确定性的倾向会如何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或者说,具有何种行为取向的管理人员在制度环境变革时期更能让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为此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

对风险有效地管理要求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应变能力。近几年来,战略管理研究对组织双元化(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的问题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兴趣,研究的重点多在于一个企业如何能达到组织双元化(Cao et al., 2009; Duncan, 1976; Gibson & Birkinshaw, 2004; Luo & Rui, 2009),而对这种能力与经济制度环境的关系还没给予多少注意。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尽管取得根本性的技术突破的中国企业还不多,但中国企业一般具有相当强的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能力(Fisher & Simon, 2016;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Walker, 2016; Wu et al., 2010)。值得提到的是,中国分阶段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时升高,而且通过对市场的开放还不断地加强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兼有市场竞争加剧和高度不确定性两个特征的经营环境是否对企业发展组织双元化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般被认为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一种阻碍。但如果这样的经营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双元化,那么我们对不同制度环境的利弊的了解也可能会加深一步。

与组织双元化相关的是企业的学习能力。虽然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更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相比还有明显的距离,在整体上中国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近年来已

在国际上被颇多分析家认为是很强的 (Baily & Woetzel, 2015; Williamson & Yin, 2014; Yip & McKern, 2014)。当然, 影响吸收能力因素很多, 包括社会范围的教育水平和劳工市场的竞争与激励状况等 (Casper, 2000; Viotti, 2002), 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因素无疑也是重要的。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对竞争放开的行业越来越多, 企业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这种不断更新变化的制度环境有可能对企业发展学习能力也起着有利的作用。当然,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早已显示, 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种种弊端, 而经济改革的长期目标是为企业逐渐建立既鼓励竞争又公平稳定的制度环境。在制度环境趋于相对稳定之后, 什么机制能让企业保持探索精神和学习能力, 并将吸收先进技术和方法的能力转换成在技术前沿创新的能力仍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

五、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方式和结果, 探讨了在管理学研究中吸收西方理论与本地创新的关系。首先,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有选择地和有创造性地引进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是不可分开的。其次, 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制度环境出现阶段性的变化, 为管理研究既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也造成了一定的挑战。一个重要的机会是利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来研究组织和管理方法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同时, 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也对管理研究造成一些困难, 如一

种理论的适用性会由于体制变化而增强或减弱, 给研究人员的理论选择带来不确定性。文章接着讨论了建立“中国独立的管理体系”的提法, 指出对独立体系的强调不仅易失准确性而且会对中国管理研究产生不利的作用, 认为更有效的路径是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同各国经长时间研究和实践积累起来的管理学知识融合起来, 以促进人类共同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积累。

文章进一步用现有的研究实例讨论了几个来源于经济学或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包括产权理论、内部化理论、知识基础观和实物期权理论。讨论显示, 这些理论对研究中国管理问题不仅是适用的, 而且中国制度环境的动态性和独特性可帮助研究人员将这些理论进一步深化和精细化,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做出理论创新。

文章的最后部分就中国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对企业与企业家的能力及行为取向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在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分阶段转型的过程中, 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会不时地出现高升的不确定性, 而且几乎所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一开始都缺乏在市场经济里经营的知识和经验, 在很大程度上需靠摸索来推进企业的发展。在这种经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可能不仅对不确定性有较高忍耐而且有较强的风险抵消能力。同时, 他们的这种经历还可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组织双元化, 并给予企业持续的学习能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可能加深了解制度环境如何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互动, 影响他们的能力及行为取向, 推动中国管理研究的理

论创新。

接受编辑: Haiyang Li

收稿日期: 2019 年 10 月 3 日

接受日期: 2019 年 10 月 27 日

作者简介:

池太岚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UWM) Sheldon B. Lubar 商学院 Richard C. Notebaert 特聘教授。于华盛顿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担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领域编辑, 同时担任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编委会成员。研究兴趣主要为在信息不完善和潜在认知偏差的约束下进行经济分析, 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研究。

池太岚教授的著作常发表于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和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等国际顶尖期刊上。

参考文献

- [1] 曹仰锋、李平:《海尔, 中国式堂吉诃德: 张瑞敏对话詹姆斯·马奇》,《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 2013 年第 10 期。
- [2] 李海洋、张燕:《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管理学季刊》, 2016 年第 4 期。
- [3] Shenkar, Oded:《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

究》,《管理学季刊》, 2017 年第 1 期。

[4] 钟华:《企业 IT 架构转型之道: 阿里巴巴中台战略思想与架构实战》,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5] Alchian, A. A., & Demsetz, H.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795.

[6] Ante, S. E. 2012. Huawei's Ally: IBM.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0872396390443294904578046872036296296>.

[7] Arrow, K. J. 1969.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Allocation. In Kenneth J. Arrow (Ed.), *Collected Papers of Kenneth J. Arrow*, Vol. 2, Oxford: Blackwell.

[8] Baily, M., & Woetzel, J. 2015.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innovation-research-and-development-leader-by-martin-neil-baily-and-jonathan-woetzel-2015-10?barrier=accesspay>.

[9] Ball, E., Chiu, H. H., & Smith, R. 2011. Can VCs time the market? An analysis of exit choice for venture-backed firm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4: 3105-3138.

[10] Barzel, Y.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Brav, A., & Gompers, P. 1997. Myth or reality? The long-run under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Evidence from venture and nonventure capital-backed companies. *Journal of Finance*, 52: 1791-1821.

[12] Buckley, P. J., & Casson, M. C. 1976. *A Long-ru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Holms & Meier.

[13] Campbell, D., Meyer, M., Li, S. X., & Stack, K. 2015. *Haier: Zero Distance to the Customer (A)*.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 [14] Cao, Q., Gedajlovic, E., & Zhang, H. 2009. 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 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 *Organization Science*, 20: 781-796.
- [15] Casper, S. 2000. Institutional adaptiveness,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diffusion of new business models: The case of German biotechnology. *Organization Studies*, 21: 887-914.
- [16] Chandler, A. D. 1966. *Strategy and Structur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 [17] Chang, S-J. 2019. When to go it alone: Examining post-conversion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 998-1020.
- [18] Chi, T. 1994. Trading in strategic resources: Necessary conditions, transaction cost problems, and choice of exchange structur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271-290.
- [19] Chi, T. 1996. Performance verifiability and output sharing in collaborative ventures. *Management Science*, 42: 93-109.
- [20] Chi, T. 2000. Option to acquire or divest a joint ventur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665-687.
- [21] Chi, T., & Roehl, T. W. 1997. The structuring of interfirm exchanges in business know-how: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venture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8: 279-294.
- [22] Chi, T., & Zhao, Z. J. 2014. Equity structure of MNE affiliates and scope of their activities: Distinguishing the incentive and control effects of ownership.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50: 634-636.
- [23] 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24] Cumming, D. J., & MacIntosh, J. G. 2003.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full and partial venture capital exi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7: 511-548.
- [25] Davidson, W. H., & McFetridge, D. G. 1985. Ke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6: 5-21.
- [26] Duncan, R. B. 1976. The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 Designing dual structures for innovation. In R. H. Kilmann, L. R. Pondy, & D. Slevin (Eds.),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Vol. 1: 167-188. New York: North-Holland.
- [27] Eswaran, M., & Kotwal, A. 1985. A theory of contractual structure in agricul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352-367.
- [28] Fischer, B., & Simon, D. 2016. How Chinese companies disrupt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6/07/how-chinese-companies-disrupt-through-business-model-innovation>.
- [29] Gibson, C. B., & Birkinshaw, J. 2004. Th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209-226.
- [30] Gomes-Casseres, B. 1989. Ownerships structures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1: 1-25.
- [31] Guo, D., & Jiang, K. 2013.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2: 375-395.
- [32] Grossman, S. J., & Hart, O. D.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691-719.
- [33] Hart, O. D., & Moore, J.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119-1158.
- [34] Henderson, R., & Cockburn, I. 1994. Measuring competence? Exploring firm effects in pharmaceutical re-

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63–84.

[35] Hennart, J-F. 1989. Can the “new forms of investment” substitute for the “old forms?” A transactions co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 211–234.

[36] Hofstede, G. 1983.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 625–629.

[37] Kogut, B., & Singh, H. 1988.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 411–432.

[38] Krueger, A. 2011. 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Yifu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222–226.

[39] Li, H. Y., & Atuahene-Gima, K. 1999. Marketing’s influence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in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7: 36–58.

[40] Li, X., Worm, V., & Xie, P. 2015. *Solutions to Organizational Paradox: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Frederiksberg: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wp]. Copenhagen Discussion Papers, 49.

[41] Li, Y. 2008. Duration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 staging: A real op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497–512.

[42] Li, Y., Chi, T., & Lan, S. 2018. *To Cash Out or Not? Venture Capital Exit After Investee IPO*. Working paper.

[43] Lin, J. Y. 2012.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44] Lin, J. Y., Monga, C., & Standaert, S. 2017. *Beating the Odds: Jump – Sta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5] Lu, F. 2005. *Policy Choices in Developing*

Chinese Indigenous Automotive Indust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46] Luo, Y., & Rui, H. 2009.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3: 49–70.

[47] Margrabe, W. 1978. The value of an option to exchange one asset for another. *Journal of Finance*, 33: 177–186.

[4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The China Effect on Global Innovation*. McKinsey & Co. <http://www.mckinseychina.com/wp-content/uploads/2015/07/mckinsey-china-effect-on-global-innovation-2015.pdf>.

[49]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0] Pan, Y. 2002. Equity ow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The impact of source country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3: 375–384.

[51] Paine, L. S., & Crawford, R. J. 1998. *The Haier Group (A)*.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52] Peng, M. W. 2005. Perspectives—from China strategy to global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 123–141.

[53] Peng, M. W., Sun, S. L., Pinkham, B., & Chen, H. 2009.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3: 63–81.

[54] Pope, S., & Meyer, J. W. 2015. The global corporat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 173–177.

[55] Rapp, J. K., Bernardi, R. A., & Bosco, S. M. 2010. Examining the use of Hofstede’s uncertainty avoidance construct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 25-year review.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4: 3–15.

- [56] Rodrik, D. 2011. 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Yifu L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227–229.
- [57] Stiglitz, J. E. 1989. Incentive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Empirica*, 16: 3–29.
- [58] Stiglitz, J. E. 2011.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230–236.
- [59] Stulz, R. M. 1982. Options on the minimum or the maximum of two risky asse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 161–185.
- [60] Teece, D. J. 1977. Technology transfer by multinational firms: The resource cost of transferring technological know-how. *Economic Journal*, 87: 242–261.
- [61] Trigeorgis, L., & Reuer, J. J. 2017. Real options theory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42–63.
- [62] Viotti, E. B. 2002. National learning systems: A new approach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nd evidences from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South Kore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69: 653–680.
- [63] Walker, R. 2016. Innovation at the speed of China. *Insigniam Quarterly*, 4: 42–48.
- [64]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65] Williamson, P. J., & Yin, E. 2014. Accelerated innovation: The new challenge from China.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55: 27–34.
- [66] Wu, X., Ma, R., & Shi, Y. 2010. How do latecomer firms capture value from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 secondary business-model innovation perspective.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57: 51–62.
- [67] Yip, G., & Bruce, M. 2014.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ca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9: 2–10.